

蘇惟珩史學論文集

西映文藝出版社

承襲史學論文集

(闽)新登字 05 号

苏双碧史学论文集

苏双碧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七二二八分厂印刷

(福州园墙街 17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9.25 印张 2 插页 465.7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534-814-6

I·709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苏双碧 近照

苏双碧 生于1934年,福建省南安县厝斗村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担任过北京市历史学会秘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光明日报高级编辑、理论部主任,现任求是杂志副总编辑、编审。主要社会兼职: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师大兼职教授,《炎黄春秋》、《史学理论研究》等杂志编委。

主要著作:《苏双碧选集》、《苏双碧史学理论集》、《吴晗传》(合写)、《洪秀全传》、《太平天国史综论》等二十余种,论文一百多篇。著述共500万字左右。

前言

在编辑出版我的《选集》和《史学理论集》之后,还有几十篇学术性较强的史学论文,这些文章大多是对某一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专门探讨和评价的。这里选就其中的三十六篇,编成这本《史学论文集》。由于多年来接触太平天国历史较多,这个集子收入的文章也以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文章为多,共二十三篇,三十多万字。文章编排程序分成四组:第一组是研究太平天国人物的,有十七篇文章,对十一位太平天国的主要领袖人物和将领进行较系统地评价;第二组六篇,主要是写太平天国事件和对诸王进行综合研究的;第三组是对有关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的,共七篇。古代史的文章我写得不多,有关李贽研究的两篇文章已分别收入其他两个集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而关于近代史的文章,大多属于理论性的,已收入《史学理论集》之中;第四组是有关吴晗研究的文章,其中《教育家吴晗》、《论吴晗的治学道路》、《学生时代的“太史公”吴晗》等三篇文章是和王宏志合写的。有关研究吴晗的文章发表较多,这里选入六篇,聊表对吴晗同志的一点缅怀心意。

本集选入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发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都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对某一学术问题谈一些看法。为照顾文章发表时的环境和学术思想水平的真实情况,文章都没有作过改动。现在之所以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奉献给读者,只是想在这些学术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参与一点我的见解而已。至于读者对本书

350089

在编辑这本集子的过程中,得到苏忠先生、李仲树先生,海峡文艺出版社林正让、叶恩忠先生及福建省明天撰稿公司的大力帮助,特致以衷心地感谢!

苏双碧

一九九四年五月四日

于北京沙滩

180023

目 录

前 言·····	(1)
杰出的农民领袖洪秀全·····	(1)
关于洪秀全从改良到革命一段思想的历史考察·····	(25)
关于杨秀清评价的几个问题·····	(39)
杨秀清的功绩和局限·····	(74)
论太平天国运动的奠基人冯云山·····	(84)
评韦昌辉·····	(105)
析翼王石达开的功和过·····	(125)
石达开出走及其战略得失·····	(156)
石达开参与诛杨密议质疑·····	(183)
论北伐战争及其统帅林凤祥、李开芳·····	(187)
论洪仁玕及其新政·····	(209)
论杰出的青年将领陈玉成·····	(237)
陈玉成“意在救安省”的军事思想·····	(254)
安庆失守前后陈玉成的军事得失·····	(267)
后期太平天国的优秀将领李秀成·····	(289)
《李秀成自述》及其对李秀成的历史评价·····	(306)
关于李世贤评价的几个问题·····	(318)
论太平天国首义诸王·····	(338)
《天兄圣旨》——洪、萧互相利用的产物·····	(371)
论太平军北伐的战略问题·····	(381)

“天京事变”始末·····	(398)
从枞阳会议到三河战役·····	(413)
会剿武汉以救安庆的历史真象·····	(421)
试论唐初经济发展的原因·····	(435)
清官海瑞·····	(446)
试论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	(459)
抗倭英雄戚继光·····	(465)
论林则徐禁烟	
——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	(485)
近代边疆危机中的左宗棠·····	(511)
康有为和公车上书·····	(531)
著名的教育家吴晗·····	(537)
吴晗的治学道路·····	(577)
吴晗在学生时代的著作和研究方向·····	(587)
从吴晗致胡适的一封信谈起·····	(599)
吴晗和《益世报·史学》·····	(604)
吴晗和《朱元璋传》·····	(607)

杰出的农民领袖洪秀全

洪秀全生于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即清嘉庆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广东花县官禄埗人。洪秀全原名火秀，读书时改名仁坤，创立拜上帝教后，改名秀全。

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人物中，洪秀全是一个最关键的人物，他的思想、行为和太平天国的发展、衰败息息相关。作为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爆发在中国资本主义因素正在增长而封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开始侵略中国之时，这就决定了洪秀全领导的这场革命运动，是赋予新的内容的。历史事实表明，洪秀全不论是引进了“独一真神皇上帝”，还是提出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都是旧式农民战争所未曾有过的。至于他赞成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编》的主要内容，这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态度，更不是什么“旧式”农民战争领袖所能够做到的。洪秀全是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这些造就他成为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主张具有新旧时代承前启后的特点。尽管洪秀全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思想中存在许多旧的痕迹，并铸成他的许多失误和错误。但洪秀全仍然是一位值得肯定的杰出历史人物。

创立拜上帝教 改造社会风气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新旧思想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互相交织、相互矛盾,决定了洪秀全对周围事物的看法,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因袭封建社会的旧观念。他从事政治活动是从他接触外国传入的早期基督教教义开始的,但他并没有被束缚在那“劝人为善”的教义上,而是一开始就想接过外来的宗教,对腐败的中国社会进行改造,尽管这个改造的方向是不明确的、朦胧的,但他毕竟是从通过科举成名的幻想中向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洪秀全是封建社会乡村的知识分子,“自幼即好学,七龄入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读书未几即得其业师及家族之称许。其才学之优俊如此”。由于封建思想的熏陶,洪秀全和许多中国封建社会下层知识分子一样,一心想走进封建统治阶级的士阶道路,希图通过科举途径“一举成名”,跻身于封建社会上层。他从十六岁起就到广州赴科考,之后又多次赴考。据说每次都是“名列前茅”,但每次都是“落第而归”,考场的失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使他失望,封建官场这块诱饵,强有力地吸引着他。留恋不舍,发奋读书,失败了再考,是他挣扎和奋斗的目标。

但是,历史的进程总是要对人们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总是要迫使某些历史人物不得不改变原先划定的航向。洪秀全醉心于科考时,中国的社会已是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和白银的大量外流,外国资本主义兵舰炮击广州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鸦片战争爆发,三元里人民声势浩大的抗英斗争,《南京条约》的签订,这些急剧的社会变迁,对距离广州只有百里之遥的花县,必然要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洪秀全在激烈动荡的一八三六年到

一八四三年七年中,先后四次到广州赴考,但考场上的失败和新形势的冲击,势必动摇他一心想往封建官场里钻的信念。

洪秀全科场成名的幻想破灭之后,时代的变幻风云便会成为激发洪秀全寻找新的出路的根据和动力。一八四三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考落第,使他完全失去走仕宦道路的信心。他熟读孔孟之书,却长期被排斥在官场之外,仕宦道路的阻塞,使洪秀全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对曾经使他陶醉过的孔教儒学也开始怀疑了。七年前,即一八三六年,他在广州得到《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时,并不在意。在最后一次科考失败之后,对仕途绝望的情况下,洪秀全的亲戚李敬芳告诉他:“此书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这才引起洪秀全的注意,而“潜心细读之,遂大觉大悟”^①。饱尝儒学的洪秀全,对于西方基督教的一些教义,自然是感到奇特和新鲜的。况且,梁发的《劝世良言》的一些内容,也深深打动了洪秀全的心灵。例如其中写道:“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文昌、魁星)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吗?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这些话自然有力地击中了洪秀全的痛处,连续的考场失败,使他很容易接受《劝世良言》的说教。文昌、魁星既然帮不了洪秀全成名,洪秀全便有理由搬掉文昌、魁星,转而相信天父皇上帝了。他很快地接受了《劝世良言》的说教,只要敬拜独一真神皇上帝,便可以走上幸福的道路,中国便可以有希望。他也想通过拜上帝劝人为善,改变“人心浇薄”的恶习,扭转“世道乖漓”的局面,等等,一言以蔽之,想通过组织拜上帝会对中国社会风尚和道德进行改造。

《劝世良言》使洪秀全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都敬拜上帝,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和超度。《劝世良言》的内容对洪秀全当然谈不上是什么革命思想的启迪,而是使他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6页。

立志成为一名基督教的信徒。并潜心接受了《劝世良言》信“独一真神皇上帝”的说教。这个“独一真神”给洪秀全创立新教以启发,并成为他立志改造中国的起点。

那么,对洪秀全从西方学到拜“独一真神皇上帝”这件事应该怎样看呢?有人认为是学到了糟粕,有的则认为是当作革命的宗教外衣而引进的。我认为,洪秀全从西方迎来了“独一真神”这件事,不能小视,它是需要有很大勇气和魄力的,它的深厚历史根源恰恰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崩溃,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这种新的经济因素不但给洪秀全以动力,也给洪秀全以勇气。他接受异端,竟然敢拿“独一真神皇上帝”和两千多年来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孔教对抗,宣布孔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可谓有胆有识。尽管他的这个看法不尽确切,但在一百三十多年前,确实是了不起的创举。

一八四三年洪秀全和李敬芳等人按照《劝世良言》所规定的程序自行洗礼,“对皇上帝祈祷,许愿不拜事邪神,不行恶事,而恪守天条。彼等于是自己灌水于顶上,自言‘洗除罪恶,去旧从新’。”之后,仿照《劝世良言》所谓“我是有罪过之人,若不倚赖耶稣代赎罪之功劳,而我的罪过,怎能求得神天上帝白白赦免乎?”的说教,写了一首诗:“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代赎全,勿信邪魔遵圣诫,惟从上帝力心田,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①,表明他要做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随后他又写了一首诗:“神天之外更无神,何教愚顽假作真。只为本心浑失却,焉能超出在凡尘”^②,这两首诗都没有越出《劝世良言》的思想范围。事实上,也只是一种宗教的语言。否则,洪秀全作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善良的农家子弟,何“罪”之有,更谈不上有“滔天”的“罪恶”了。

但是,大约连洪秀全也没有意识到,当他决定抛弃孔教(虽然还只是形式上的)时,他的行为就已经不仅是单纯的宗教因素了,

^{①②}韩文山:《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7页。

而是必然要带来政治后果的。既然洪秀全确认“神天之外更无神”，就必然要蔑视其他一切偶像崇拜，这就产生了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将各自所在的“书塾中之偶像尽行除去”，并把“馆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来龙之妖魔”也一律除去，公开向孔教宣战。尽管这种行为只是出于宗教所然，但却和传统的神权相抵触。反对偶像崇拜首先要遭到习惯势力的反对，同时又触犯清王朝的国教。这个举动，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冲破旧的封建思想的禁锢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洪秀全的反孔举动，立刻遭到乡间封建势力的反对，剥夺了洪秀全在私塾中任教的教席。于是一八四四年，洪秀全便和冯云山等人离开家乡沿珠江三角洲的顺德、番禺、南海等地进行考察，想寻找一个适于宣传真道，发展拜上帝教的地方。所到之处，百姓对拜上帝教都比较冷淡。后来他们又沿英德、函江、阳山等地，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广西贵县的赐谷村。在表兄黄盛均家里住了半年后，发展了一百多名拜上帝教的教徒。后来因黄盛均家穷，生活无着。冯云山到桂平县紫荆山建立拜上帝教组织，洪秀全则回到家乡从事拜上帝教教义的编写工作。从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四七年，先后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重要著作。通过对教义的改造，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社会进行改造的强烈愿望。他在《原道醒世歌》中对当今之世痛心疾首，他指出：“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故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者有之；甚至同国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有之；……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陵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乎！”^① 这些慷慨激昂的言论表明了他对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愤懑态度，社会已经到了不进行改造就不能前进的地步了。那么，怎样对这个黑暗社会进行改造呢？洪秀全渴望有一个平等的社会，使“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

^① 《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391页。

道不拾遗”^①。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都是平等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彼此之间不存“此疆彼界之私”，不存“尔吞我并之念”^②。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拜上帝，信“独一真神皇上帝”，理由是，皇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③。信皇上帝就能和番国共沾天恩，平等相处。诚然，洪秀全在社会激变的烽火中，除了看到“番国”的鸦片、大炮之外，还看到“番国”是强盛、先进的国家。但是，怎样走“番国”强盛的道路，向“番国”学习，洪秀全这时还缺乏像林则徐那样的社会实践，也没有像魏源那样对外国资本主义世界的了解。因此，他还不能提出“师夷长技”的口号，也不能有后来洪仁玕提出“和番人并雄”的杰出主张。他这时候只是看到了腐败的清王朝必须进行改造，于是，他身体力行，从本人本村做起，一面在村里宣传拜上帝教的教义，一面对乡村进行风化工作，劝人为善。他亲自做了几块木牌，上面写了五条戒律：一是通奸乱淫者打；二是诱奸妇女者打；三是忤逆父母者打；四是偷窃赌博者打；五是游荡作恶者打。把这些木牌分发到各家，使其时刻警戒。此举表明洪秀全以教治道，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他想通过拜上帝，劝人为善来教化中国的民心。应该说洪秀全在村里的努力，是收到一些效果的，但这是微乎其微的。他在家乡传教多年，所信者无几，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在洪秀全改造教义的过程，他显然树立一种信念，认为“番国”信奉天父皇上帝，就比中国强盛，从而产生了中国应与“番国”平等的思想。这是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精华，因为洪秀全既然看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和清王朝的腐败，就为洪秀全后来的思想发展，提供了根据和条件。并使洪秀全逐步成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

① 《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 391 页。

②③ 《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 392 页。

洪秀全革命思想的确立

一八四七年上半年,洪秀全到广州从罗孝全学圣经。后来因罗孝全不为其洗礼,洪秀全便决定第二次入桂。严格地说,洪秀全的革命思想和行动,是出现在一八四七年第二次进广西以后。促使其成为革命者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看到冯云山在这里建立的拜上帝教,目前已拥有数千人,遍及桂平县周围各县。在贫困山区,竟有如此众多的信徒,洪秀全大受鼓舞;另一方面,广西各地会党纷纷起义,社会矛盾十分激烈。在紫荆山地区,以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为主体的拜上帝会和地主武装团练不断发生冲突,拜上帝会会众要求结伙自卫。洪秀全这个教主,原先是有名无实的,教徒们只知道有洪秀全其名,却谁也没有见到洪秀全其人。而今他来到紫荆山,教主地位也就必然成为会众对抗清王朝的旗帜了。紫荆山的群众运动把洪秀全推上了革命的征途,在以教治道改造社会的道路上辗转几年的洪秀全从此开始振作,思想为之一变。

那么,史书为什么大量记载了洪秀全在一八三七年后就有许多充满着革命内容的诗句呢?这是必须进行认真考察的一个问题。一八四七年八月,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形势把他推向阶级斗争的前列,成了众望所归的教主。按照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习惯,洪秀全也必须是受命于天的。于是,冯云山、洪仁玕以及洪秀全本人在广东进行了一场紧张的策划,洪秀全“受命于天”的神话就编造出来了。办法就是把洪秀全一八三七年落第之后的大病中的“异梦”作了加工,并赋予新的内容。例如,后来洪仁玕曾经说过,洪秀全在一八三七年病中就作了“手持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①的诗句,并说他一八三六年在落第回家的途中就写过:“龙潜海角恐惊

^① 《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第二册,第848页。

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①。洪仁玕在《英杰归真》里更说,洪秀全得病时,就吟出“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的诗句。这些材料的出现无非是要说明洪秀全早就胸怀大志,具有反抗清王朝的革命思想。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洪秀全正醉心科举,他的全部心血是想挤进封建官场,决不会有如此大胆的犯上之言,洪秀全再三赴考的行动本身就是明证。

事实上,洪秀全来到紫荆山,亲临其境,当上了拜上帝会这个农民革命团体的教主,完全是意外之事,并非洪秀全努力实践的结果,而是冯云山把亲自缔造的教主地位留给了洪秀全。紫荆山的形势甚至连洪秀全也十分惊喜,但冯云山既然虚教主位以待之,洪秀全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教主。如果把冯云山的艰苦创业作一简单回顾,就可以看出,洪秀全的革命思想确实是形成于此时。

早在一八四四年,洪、冯第一次离开家乡传教时,遍游广东十多个县后,来到贵县赐谷村。有人说洪、冯此次来贵县是“选择革命根据地”,有人认为是一次“起义”的准备活动,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从洪、冯在赐谷村宣传的内容看,其中心只是劝人信“独一真神皇上帝”、“悔过从善”,后由于经济上遇到一些困难,即所谓“表兄家苦”,就知难而退。可见洪秀全当时只是想按照《劝世良言》的规定进行传教,还不具备革命的信念。而冯云山则不同,他离开了赐谷村之后,来到桂平县的深山野岭之中,静悄悄地把建立拜上帝会付之实际行动。他历尽千辛万苦,在紫荆山发展会众达二千余人之多。在三年的传教过程中,冯云山始终是尊崇洪秀全为教主的,因此,洪秀全的名声成了拜上帝会会众景仰和崇拜的象征。僻静的山区人人都知道有教主洪先生其名,但谁也未曾见过洪先生其人。大概也正是这样,教主越是神秘,群众越是见不到教主,洪秀全的声名就越大。冯云山在洪秀全不知不觉之际,把他抬上了教主地位,成了一方之雄。这个重大的收获和成功,使三年后来到紫荆山区的

^① 《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第二册,第848页。

洪秀全为之瞠目,惊喜交集。他由衷地感谢冯云山的忠心,更虔诚地赞美天父皇上帝的无边神力。在他看来,没有皇上帝的指点,紫荆山决不会出现如此鼓舞人心的奇迹。

恩格斯曾经指出:“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①。举凡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宗教组织活动,不少都是农民起义的前奏,冯云山在广西大规模地组织拜上帝会,势将导致农民革命的伟大风暴,这对冯云山来说,诚然是清楚的。设若他仅仅是为了传教,当无必要选择紫荆山区。不论当时还是后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大部分是先于城市,后及农村,穷山僻壤则很少波及。冯云山选择紫荆山地区,显然是因为这里聚集着一批生活极端贫苦的烧炭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就会产生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杨秀清是冯云山最早发展入会的,据说,冯云山在动员杨秀清入会时说:“你以烧炭为业,实无出路,……如大家共图大事,求谋根本出路。”^②又据说,冯云山曾经在他的书房门前排着“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③的对子,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是可能的。李秀成也说,当时“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④。可见,加入拜上帝会的绝大部分是社会最低层的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他们和地主阶级的团练是对立的。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被扶正教主地位,正是这样一个富有政治色彩的拜上帝会的教主,这和原来洪秀全企图求助于罗孝全洗礼的耶稣教迥然不同。洪秀全毕竟是一个饱经清统治阶级欺凌的知识分子。先失意于考场,后受阻于洗礼,现在摆在面前的这种中国式的拜上帝会,居然有如此伟大的生命力。洪秀全将他在广州礼拜堂阅读的《新约》、《旧约》以及新熟悉的基督教仪式,健全了拜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

② 《太平天国在广西资料汇编》第58页。

③ 《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第37页。

④ 《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第二册,第788页。